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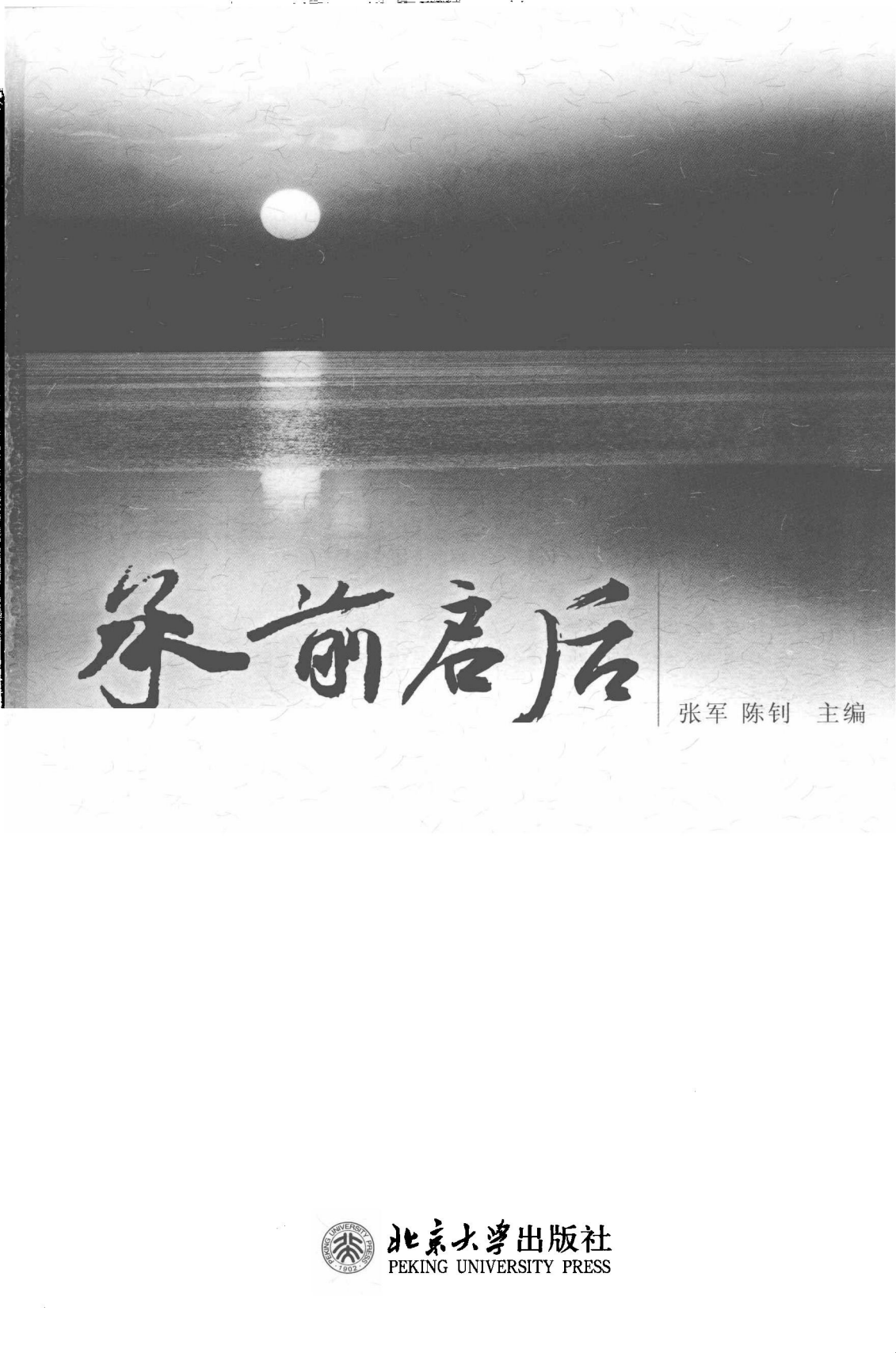
承前启后

张军 陈钊 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证与展望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承前启后

张军 陈钊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承前启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证与展望/张军,陈钊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301 - 15830 - 2

I. 承… II. ①张… ②陈… III.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874 号

书 名: 承前启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证与展望

著作责任者: 张 军 陈 钊 主编

责任编辑: 朱启兵 李晨乐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5830 - 2/F · 229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em@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4.75 印张 218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中国的经济改革,刚过而立之年。好一个波澜壮阔的 30 年!这是经济制度的一场变革,更是政治方向的自我纠偏。若不是有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就不会那么顺利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若不是决策者勇于承担政治风险,不合理的制度还会不断制造内耗。这场看似自上而下的改革,背后也是上上下下各种力量的角逐,是改革的十字路口前领导人一次次的权衡取舍。

能够见证甚至参与中国的这场改革应当是一种幸运。从这场改革中寻找智慧并服务社会则是学者的责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出于学术激情和社会责任感而致力于研究中国这场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作为一个以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机构,自 2008 年初开始,我们就着手策划这一系列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 30 年大型“周年公开讲座”。我们邀请的演讲者中,有海内外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权威学者,有亲历政策制订的学者型官员,有长期深入基层执着于田野调查的改革见证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一系列公开讲座的内容,包括演讲、提问以及回答。为了体现演讲的现场感,我们保留了演讲内容的口语原貌,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如临其境,与我们的演讲者进行一次次的思想交流。

当然,这是一项未尽的工作。正如本书的书名《承前启后》所暗含的那样,我们期待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取得新的突破,期待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种种磨难终将成为一笔财富。在刚刚经历了 30 年的改革开放,又将迎来新中国建国 60 周年之际,这是我们的愿望。

编 者

二零零九年夏

目

录

Dwight Perkins

中国未来的经济挑战/ 3

高尚全

改革开放 30 年的体制创新与思想解放/ 27

许成钢

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 47

周其仁

重新界定权利之路

——纪念中国改革 30 年/ 73

张 军

中国的价格改革

——真实历程与现实意义/ 95

赵人伟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效与挑战

——我的参与和评价/ 115

王绍光

波兰尼的《大转型》和中国的大转型/ 143

张曙光

资源要素租金与国有企业改革/ 169

樊 纲

转轨经济学与中国 30 年的体制改革/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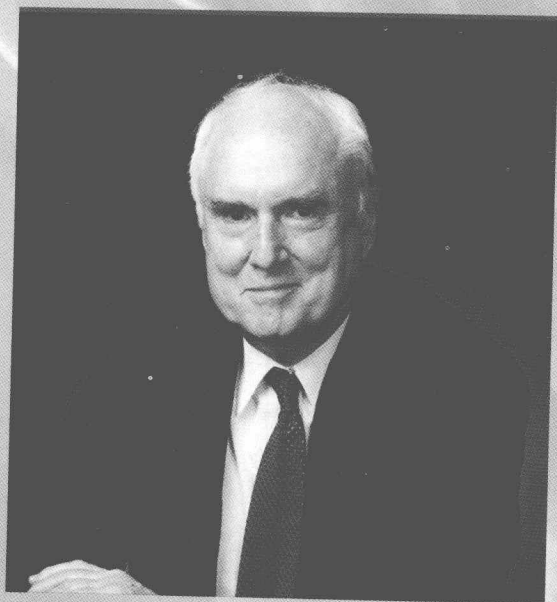
张军、陈钊、陆铭

承前启后

——中国经济改革 30 年的回顾与展望/ 205

中国 未来的

经济挑战 >>



主讲人: Dwight Perkins 教授, 哈佛大学经济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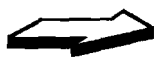
评论人: 张军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 陈钊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时 间: 2008 年 5 月 6 日 16:00—18:00



中国未来的经济挑战



演讲全文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2008 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值此之际，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下，通过举办周年公开系列讲座的形式来庆祝这一伟大时刻。出席今天讲座的，还有来自《文汇报》、香港《经济导报》、《经济观察报》和“中国讲座网”的媒体界朋友。这一系列讲座的目的在于使全世界研究中国改革的学者们和参与改革决策的政府官员们彼此能够交流宝贵的观点。

今天是我们的首次讲座，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今天的演讲者——Dwight Perkins 教授。Dwight Perkins 教授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做出了大量杰出的贡献。他是哈佛大学 Harold Hitchings Burbank 政治经济学研究教授。他撰写或主编了 12 本著作，发表了 100 多篇关于经济史和经济发展的文章，其中有许多涉及中国、韩国、越南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注的问题包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长期的农业发展、工业政策和东亚增长的源泉以及经济和法律制度在东亚增长中的角色。他曾为韩国、中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政府服务，参与经济政策和改革的建议咨询。



Perkins 教授同时也是复旦大学的访问教授,所以我要说“欢迎回到复旦!”我们都期盼您的精彩演讲!

Perkins:非常感谢主持人!

很荣幸回到复旦。我告诉张军教授和陈钊教授,事实上我 1975 年就来过复旦,参与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之后我又来给学生做过一系列讲座。在 1975 年,没有学生可以让我做讲座,至少没有学生可以听我讲座。从那以后,我又回过复旦一两次。能够再回到这里,我真的非常荣幸。我非常遗憾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不得不站着听我的讲座。

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未来经济的挑战”。我最近碰巧在北京生活了几个月,所以身边没有多少材料。我告诉张军教授,我非常愿意来做讲座,不过我只能把手头上有的材料整理起来。关于中国的将来有两个基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同时也关系中国的现状,是中国继续前进的两大挑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能否保持高速增长?换个方式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中国能否满足保持高速增长的一系列条件以及在多长时间内能满足这些条件。我今天演讲的第一部分内容将回答这个问题。第二部分的内容将关注经济发展中主要的经济结构转换——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目前在中国已经处理得很好,我将重点讨论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讨论将来、预测将来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人们想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企业家想知道生意是否会兴隆,自己会不会越来越富有。但是预测未来不是为得到一个数字——中国经济能增长多快?8%、9%还是10%。这仅仅是得到结果前的一小步。如果你预测足够远的时间,这或许很有用。当预测20年以后,好处是——如果我对了,我可以提醒人们,我是多么的聪明;但要是我错了,当然没人会记得。所以,结果怎样都不错。但是真正去预测中国未来的原因,不是为了得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更多的是为了理解中国要保持高速增长将要面临的挑战。

所以首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有许多的角度来观察预测,可以用一个巨大、复杂的模型来预测,也可以用简单的线性分

析。复杂的经济模型不是很有必要,而且在观察长期经济增长的时候未必精确。当你在美国的时候,为了对付一个复杂的经济模型,可能有 10 个博士处理模型中的每个相关性,但在中国不太可能。因为当你使用更多更复杂的模型时,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线性分析则过于简单。事实上我们之前用的方法是经济学研究最为熟悉的统计,这是增长分析的源泉。在这里我们使用简单的生产方程,把增长看做是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投入的产出,至于全要素生产率,我稍后会详细介绍。

Robert Solow 发展了这一方法,并因此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沿用别人的成果并不会使你获奖。这一方法事实上对于经济增长推动因素的研究非常有用,特别是对于中国以及东亚的研究。我的合作者 Tom Rawski 和我基本上沿用这一方法来精确度量。我们有中国从 1952—2005 年的经济增长数据。

为什么中国在 1957—1978 年经济增长这么缓慢,只有 3.9% 呢?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总体生活标准的增长水平。顺便说一句,这些不是官方的统计数据,我们只是使用了官方数据来调整价格扭曲。在 1957—1978 年,有非常快的资本投资速度,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这当然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导致的。什么导致经济增长率在 1978 年上升到 9.5%? 这巨大的跨越是生产率带来的,从负数增长到 3.8%。事实上正是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给定投资水平下的高 GDP 增长和高资本形成速度。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生产率的故事。

中国的投资率在改革前后大体相同,改变的是生产率。对我而言,这是非常自然的结论;不过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他们试图证明还是资本积累的结果。我开始研究这个命题,即中国今天经济增长的真正推动力是全要素生产率。

现在轮到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这包含导致生产率增长的所有东西。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指研发;在发展中的经济体,主要表现在管理、制度方面的改进,当然也包括研发。但是,在发展的初期并不主要靠研发促进发展,中国 1978—2005 年的发展也不是这样的。

因此这个问题现在变成:中国将以多快的速度增长? 如果我们用



先前这种方法分析,我们需要去预测中国的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形成速度。我将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

这种分析的一些步骤很简单。首先来估计资本形成。在如今的中国,投资和资本形成的速度已经很高。问题是这个速度将来要下降。发展中国家一般有三种典型的储蓄,并最终转化成资本形成;当然如果你在金融危机的阿根廷,所有的钱都跑到纽约的时候除外。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的投资机会,所以储蓄总会转化为投资。有两种储蓄来源比较难分析:一种是企业储蓄,另一种是政府储蓄。我们假设这两种储蓄保持与今天大体相同的水平,真正的问题是家庭储蓄会怎样变化。

正如你们所知,如今中国家庭储蓄率很高。但储蓄率这么高主要是为养老,同时抚养孩子和赡养父母。而高储蓄率只有当一个经济体中工作的人数与不工作的人数的比率较高的时候才会出现。一旦这个比率下降了,储蓄率也会下降。在中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达到某个时点,会出现很多老人,劳动力也会短缺。问题是:什么时候这个比率会下降?这是不是将来迟早会发生的?我的回答是,这将发生在至少20年以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还是在20世纪50—70年代生育潮中出生的。

所以这个比率还是会保持20—25年;一旦过了20—25年,这就会下降;到了2035年或2045年之后,就会下降到低点,这时中国就会面临比较严重的问题。不过这种情况现在不会发生,所以这是基本的提示:中国的储蓄和投资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水平。

劳动力则比较好预测,因为那时的劳动力现在已经出生了。所以我们只要加上多少人会在学校诸如此类的假设。在这类的估计中,应当考虑劳动力的质量——通常指教育情况。我们假设中国的教育会和日本的相同发展阶段的情况类似,比如说完成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

但是即便这样做,劳动力增加的最低速度也只有先前的一半。所以把教育考虑进来,并没有增加多少劳动力的供给。现在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真正巨大的作用已经发生在过去。所以教育并不会对劳动力的增长产生太多作用。

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有点不同的问题。现在我们有劳动力的低

增长和持续的投资的高增长。但一切都还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所以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会怎样变化？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同时指向不同的方向，因此我们尝试估计当中国为了保持6%或9%的经济增长速度，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多少。这并不是预测经济增长率会达到6%或9%，而是估计如果想达到6%或9%的增长率，需要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小，这是思考中国能否达到这种速度的现实基础。

我分析的结果显示，当经济增长保持9%时，中国的TFP接下来10年要达到4%，然后达到4.9%—5.6%。这样的速度和过去比怎样呢？在改革之后，这个比例是3.8%。所以为了保持9%的增长，中国不得不使得TPF的增长比现在快得多。我们观察中国经济至今的表现，至少在生产率方面有三次大爆发：1979—1984年期间的农村改革，使当时已经松散的生产力极大地迸发；接下来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工业化带来生产力的又一解放；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是FDI大量进入中国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有一波FDI进入的高潮。

但是早期的改革某种程度上说比后来的改革容易进行。早期的改革是摆脱旧的体系，主要是发生在家庭农业，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基本上只要抛弃旧的直接与农业相关的体系。乡镇企业从某种程度上说，至少帮助了这一进程。

但是政府所做的仅仅是放松投入上的限制。为了得到工业投入品，一个人必须向当地的计委申请，然后是更上一级的计委……如果足够幸运，最后可能得到某些机器、一些原材料和其他一些帮助。这将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

许多年之前，大概是1975年，我带领一个代表团到农村地区参观，某种意义上那是这场运动开始的时候。但是，当时的工厂仅供应当地的需求，而不会为任何其他村甚至邻村生产。为了得到产出，人们需要贸易或者利用他们的关系。我记得1975年，基本上只能去看那些生产上的标兵，而看不到一般的情况。所以我们去了大寨和其他一些地方。我们去看了制造拖拉机的地方，那真是一个供展示用的地方。他们仅仅为展示给我们看，每个人都能够制造拖拉机。那是河南的农村，他们并不真的愿意谈论拖拉机，只想把我们赶出房间，而并不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因为计划认为他们该制造别的，并不应该做拖拉机，所以他们在做一些并不是很合法的事情。但是他们需要拖拉机，



所以他们把所有的设备组装起来。不管怎样,当时的体系是这样运作的。

当管制放松,人们就可以到市场上购买设备。摆脱冗繁的计划,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比较容易。现在回答前面的问题:在已知 TFP 的另一次剧烈增长很难实现的情况下,中国如何达到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6%的经济增长率需要 TFP 增长 2%—3%,这完全在中国的能力范围之内。

所以,问题就变成,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6%—9% 中的哪个值?我们不可能达到 9%,如果你相信这个论断,不过至少可以达到 6%。当然,我把政治动乱和战争等事情抛在一边。其次,这个论断认为 9% 的增长速度不可能保持 20 年,但有可能保持 10 年、或者 10 年之内。

我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进行了估算。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国家或地区能永远保持 9%—10% 的经济增长率。这是追赶经济的增长速度,不过当你开始追赶,速度就会放慢。哪些其他经济体能告诉中国类似的增长经验呢?答案明显是东亚国家或地区。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从 20 世纪 50 年代保持到 70 年代,韩国从 60 年代开始,中国台湾从 60 年代早期到 80 年代晚期、90 年代初。正如你们看到的,此后它们都放慢了增长速度,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水平。关键是什么?当这个速度放慢时,这三个国家或地区用 2005 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几乎在相同的水平,即 13 700—13 800 美元。

中国什么时候能达到 13 700—13 800 美元呢?事实上,中国政府一两两年前才同意参与到联合国的系统中来,所以中国的购买力平价只有通过各方面收集的数据来拼凑。现在中国已经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正确统计购买力平价。但问题是中国或者亚洲开发银行是否只关注城市?所以现有的数据是,过去世界银行估计的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为 6 000 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是 3 000 美元。这两个数据可能都是错的。那正确的数据是多少?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它们平均一下。我觉得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数字是在 4 000—5 000 美元之间,很明显亚洲开发银行的数字太低,世界银行的数据太高。那么,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现在是 4 500 美元,什么时候能够达到 13 400 美元?

你们当中多少人知道 72 法则？用 72 除以任何一个数字，告诉你多少年或多久能够以这个数字的速度增长到两倍。72 除以 9 是 8，这表明 9% 的增长率在 8 年内能够成为原来的两倍；7% 的增长率则在 10 年内；10% 的增长率则在 7 年内，诸如此类。

如果中国以 7% 或者 8% 的速度增长，将来保持 10 年或者 12 年以上。但我们讨论过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下个 10 年或 20 年会放慢，虽然不大可能降到 2% 或者 3%。不管怎样，这个估计的目的是看中国能否保持高的 TFP 增长速度。

我们已经论证 TFP 必须快速增长。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某种提高。我准备给出一些一般性的基本的例子。我想举一些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并设想中国这样做了之后会怎样。这个简短讨论可以看出，总的来说，当中国看到有需要做什么事情时，它会做这件事。这可能不会按部就班，但最终会发生。一个好的例子和金融有关。

若干年以前，人们喜欢写书和文章，批判中国糟糕的金融体系。官方的坏账率是 25%，非官方估计是 40%，这意味着中国的银行足够破产好几回了。人们说这将导致大危机，但很多方面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危机不会发生。最关键的在于，中国经过一段时间使得坏账率逐渐下降。你可能不相信，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字是 5%。这是一场平稳的战斗，顺利地把这些国有商业银行从政策制定者手里的工具，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这个问题，渐渐地，政府就做对了。这让我想起了 Winston Churchill 形容美国人的一句话。他说：“美国人一般都会做对——当他们把所有的错误都犯过了之后。”我并不是说中国在做对事情之前，尝试过所有的错误，但是当你向前看，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金融部门似乎能逐渐自立。

那么政府部门急切需要做什么来提高效率，以便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达到高 TFP？你真正需要做的是让政府摆脱一大堆政策决定。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理想的模式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韩国和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这些转型经济有大量的政府参与，是高度的干预经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那是低效率的方式。有许多理由摒弃干预经济。一个高度干预的经济体系要做的事情包括以权威的方式向政府官员下达各种经济指令。这给了政府官员无数腐败的机会。我出生在芝加哥，在波士顿度过我的生活，这是

美国最腐败的两个城市。有时候计划使用 20 亿美元,结果使用了 150 亿美元。事实上这不是腐败,只是不完全竞争。但是你们要做的是使政府远离这些决策,比如说破产的问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不该由政府——政府部门的管理者或者总统决定哪家银行破产,而应该由借贷双方决定。贷方对借方说:“如果你不还清欠款,我们就强制宣告你破产!”借方要保护自己,因为法律会监管这个过程。谁来强制执行法律呢?就要通过法律和监管体系。在美国,一般是法律体系发挥作用。但是要法律体系能够在这种问题上发挥强制力,必须使法庭有完全的职权和充分的独立性。不仅仅中国在这方面存在问题,1997—1998 年经济危机时的韩国,没有法庭能够处理这类破产的案件,韩国需要至少四五万的律师来面对这一现象,而实际上总共只拥有大概四五千。中国需要在商业领域建立强大的法律体系,并在其他事务上放任市场自由处置。

所以中国的挑战在于不存在这样一个法律体系。当然这要比 15 年前好多了,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问题在于,中国需要逐步前进。当你考虑到中国的规模的时候,经济体系的压力就变得十分复杂,你们要让地方听到中央的声音,听到各个省省会的声音,听到上海的声音……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体系,需要一个地方分权的市场,来使得大部分问题显露出来。

我举这一例子,是为了说明,中国必须继续制度方面的改革,而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进步。

中国善于这一改革,它正逐步改革市场经济制度,但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果想在一两年内解决所有的问题,几乎不可能;但可以用 10 年或者 15 年、20 年,甚至三四十年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猜测中国会在保持高 TFP 的同时,保持一个稳定的高速增长。我会给出对于中国经济未来 10 年和 20 年的预测;不过我保证,如果以后发现我错了,我会否认自己给出过这样的预测。我预测现今 10% 的经济增长率很快会下降。但 8%—9% 的经济增长率会保持十多年左右的时间。接下来增长率会跌到 6% 左右,最少 5%,最多 7%;然后增长率越来越慢。这将带给中国高 GDP 和更高的生活水平。

当经济以这样的速度增长,同时会发生什么呢?我接下来只讨论其中的一个方面。基本上,经济增长的同时将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结构

转变。首先,让我来举例看看中国接下来面临哪些结构变迁。使用中国的城市化指标不能准确告诉我们农村迁移人口的变化,所以我用“农业就业人口”指标来告诉大家发生在农业的变化,这样我们会对未来20年总量的变化有所了解,我想花点时间谈谈其中的含义。

看看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中国内地的表现,特别是农业劳动力从1950—2000年发生的变化。这里我用4500美元表示中国现在的购买力平价,各位可以看到,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就业迅速下降的趋势发生在所有的东亚经济体。基本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在20年内从50%下降到10%。这一转变基本上会带来城市人口比例从40%左右上升到70%以上。如果中国遵循东亚的模式,这实质上展现了中国未来20年将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超过4亿人口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城市化的巨大跳跃将怎样发生。城市化会带来许多问题,我非常关注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独生子女政策带来城市本身人口的负增长或停滞,几乎所有城市化率的增加都源于农村移民。目前大概有2.5亿人离开农业,其中大部分来到城市,小部分留在乡村。看看现今的体系,再想想4亿人口增加会给这个系统带来的后果,这就是我所关注的问题。某天,我在北大和一群学者、政府官员开会,他们认为现在的体系很糟糕;昨天我和北京两个开发商一起吃晚饭,他们也认识到我所关注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对于在座的各位是否显而易见。但是让我来回顾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这个系统从1960年以来如何运作的事实,当然现在有些体系已经略有松懈。

核心问题是户口,也就是户籍制度。韩国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户籍制度。在中国农村居民不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他们不能把孩子送到城里的学校上学,无法支付城市的卫生体系,没有办法承担城市住房。那么他们住哪里?我不知道答案。我走访北京,建筑工人居住在工地旁边的帐篷里。有的人被戏称为“房奴”,还有的甚至躺在屋檐下面。有时候许多工人合租一个房子,他们无法和家属生活在一起。许多人把孩子留在家里和爷爷奶奶或者妈妈生活在一起,尽管这种情况在改变,不过这依然是一个趋势。所以,孩子留在农村,远离父母,基本上没有父母的关照,这在中国的农村相当普遍。这就是这

个体系现在运作的情况。我认为这个体系运作情况可能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糟糕,因为许多城市近郊的农民还是愿意离开农村到城市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找到工作,居住在类似拉丁美洲的贫民窟里。

当我 1961 年和 1962 年居住在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小山坡上到处是窝棚。一场大风暴会摧毁一千多个家庭,一场火灾也会摧毁一千来户。中国某种意义上以非常高的代价避免了这一情况。如果让农民工的子女跟随父母在城市享受更好的教育,他们就可以不再做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这些孩子应学会如何在城市生活,学习城市的文化。但他们现在只能一代代地困在农村。

现在北京政府意识到这一歧视,户口政策正在变化。逐渐明朗的是政府和居民是否合作或者是否试图保持这一非正式的歧视。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所有的农民工孩子都加入城市的公立学校,谁给他们付学费?他们付不起学费。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 1000 元,最多 1500 元一个月。这些钱尽管比在农村挣得多,但也干不了什么事情。这就是问题。

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不把家人带在身边主要原因是没有地方住,他们没办法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和其他三四个工人一起住。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除了窝棚,没办法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那么当 4 亿农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进城的时候,中国将有布满窝棚的城市。那如果政府提供住房呢?这样的成本是多少?

这样的住房要在农民工的支付范围之内,所以会是最低价格,同时我认为这样的一套住房供一家四口居住较为适宜。假设一家四口有一百平方米的住房。这是不错的住宿条件。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到这里来,去一位教授家吃晚饭,他家大概也就 25—30 平方米。所以这样的住房对农村移民而言,应该是不错的。但我不打算把住房给他们,因为他们支付不起。如果一平方米是 1729 元,那么一套房子大概 18 万人民币,没有农民支付得起这样的价格。所以,他们一定要得到补助。但如果政府为他们支付这笔钱呢?

我假设有 1.5 亿家庭,那么总的成本是 27 万亿元,大概 4 万亿美元。这是不是超出了中国的能力呢?这比中国现在的 GDP 要高些,但我讨论的是 20 年以后的事情。每年分担 1.5 万亿元人民币,最终